

1930年代中国穆斯林学者的《西行日记》*

钮松孙杰

摘要：跨文化视角对于观察世界具有积极意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西行日记》，着重记录了赵振武等中国穆斯林学者和朝觐者对于欧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神职人员、教堂、墓地和节日等进行了观察和分析。《西行日记》中贯穿了作者的爱国爱教情感，对于基督教背景欧洲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行径及其推动的现代化浪潮存在着多元认知。

关键词：《西行日记》 跨文化 西方书写 帝国主义

赵振武《西行日记》写于1930年代^②，时间自1932年11月28日至1933年5月19日，记录了作者一行护送中国穆斯林青年学子前往伊斯兰最高学府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从北平出发，乘火车经济南到南京，从上海登上意大利邮轮 Conte Rosso 号前往埃及，途经过东南亚与南亚，在沿途的中国香港、新加坡、锡兰的科伦坡、印度孟买等地登陆，遥望了亚丁湾，通过埃及苏伊士运河抵达塞得港（Port Said）并在此下船，最后乘火车抵达开罗。在埃期间，他们还前往埃及城市赫勒万和巴勒斯坦诸多圣地，并最终返回开罗。他从埃及乘意大利 Massaaua 号前往沙特朝觐，在沙期间，访问了圣城麦地那并在麦加完成了朝觐。此后，他从沙特乘坐英国蓝烟囱公司^③万宁（Memnon）号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培育A类“百年变局下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实践新发展研究”的成果，项目批准号：2022JDPA002。

② 赵振武：《西行日记》，北京：华文出版社，1933年初版，2015年再版。

③ 英文名为 Ocean Steam Ship Company。

轮船途经今马来西亚槟榔屿、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最终返回上海。

日记按照时间段和主要任务分为六个部分：出国之前；长途的海洋和沿途；在开罗；拜图洛·穆干代斯^①的一瞥；朝觐；归途。作者以跨文化的视角叙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跨地域文化，即从中国看外国；二是跨宗教文化，即从伊斯兰教看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作者的行程从中国内地延伸至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治下的中国香港、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西行日记》为观察当时中国与中东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实地记录，以及一定的观察与思考。

一、《西行日记》中对于基督教和西方的观察与思考

《西行日记》虽然主要记录的是赵振武等中国穆斯林学者和朝觐者，如何从中国循海路前往埃及、巴勒斯坦和沙特麦加、麦地那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开展朝觐和参加外事活动，并最终返回中国的全过程。但在此过程中，也留下了诸多关于基督徒、西方人、欧洲殖民者和帝国主义、穆斯林与基督徒和西方关系的诸多观察与思考，这成为分析较早走出国门游历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和朝觐者的基督教观、西方观的一个重要窗口。赵振武在《西行日记》中对于基督教和西方的观察与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于宗教节日期间基督徒生活的记录

赵振武在前往埃及的邮轮上恰逢基督教的平安夜。他在1932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明天是耶稣教的节日，所以今晚这船上的许多外国人的乘客（当然是教徒），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穿上些奇形怪状的衣服，疯狂似的在音乐厅里抱着跳舞取乐。说这是纪念他们的教主的诞日的礼节，这样，他们一直闹到夜里四五点钟的时候。”^②赵振武在抵达埃及开罗以后经历了1933年的开斋节，他在开斋节三天假期

① 英文为 Bayt al-Maqdis，阿拉伯人对耶路撒冷的称呼之一。

② 赵振武《西行日记》，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第32页，后文仅注页码。

的最后一天，即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商店（除外教人和小营业）都上着门，街上只有艳装丽服的男女老少行人，又仿佛中国当年旧历的正月初一日。”（第82页）

不难看出，他对于基督教圣诞节和伊斯兰教开斋节期间的庆祝活动进行了一定的描写特别是在节日的装束上，对于基督徒的描述是“奇形怪状的衣服”，而穆斯林则是“艳装丽服”，显然对于前者带有相对陌生的观察体验。此外，他关注到开罗“外教人”的商店在开斋节假日期间仍旧照常营业，其背后实则凸显了自1922年以来拥有形式上独立国家地位的埃及对于非穆斯林所持有的宽容态度。

（二）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争端和相处的记录

赵振武等人利用在埃及的机会和地理上的毗邻，前往圣城耶路撒冷、伯利恒等地参访。他对于当地的伊斯兰教、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历史与现实的宗教争端多有记述。

1933年2月16日，在参访圣殿山上的圣石拱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附近的劳则大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校舍的楼房，据说是当年尔撒圣人的公事房，所以耶教人总想算这块地，争了几次，都没有被他们掠夺了去；现在允许他们在每主麻日下午四时许进到校里做礼拜。”（第115页）当天傍晚前去拜访一位穆斯林领袖时，他写道：“车内不敢燃灯，因为回犹感情恶劣，汽车所经过的都是犹太人的住处，穆夫梯^①又是全回教的大领袖，怕他们有不轨的举动。”“他为巴力斯坦的回民谋独立，图生存的雄心，却又与他和他善的天性很冲突。悬石圣殿，在历史上便是回、犹、耶，三教竞争的地点，因为三教都承认那是圣地，都想抓到自己的手里；历史上已经有许多关于这项冲突的记载。论起人数来，这里只有回民二万人，犹太人却有七万五千之多；代管政府的英人，又暗助犹太人；试问这握有圣地实权的少数回教人，若没有这么一位精明强干、得人爱戴的领袖支撑着，圣地能不能到今

^① 英文为 mufti，今译为穆夫提，意为伊斯兰教教法权威。

天还在回教手里，真是疑问哩！”（第116页）

参访完耶路撒冷的第二天，即2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顺道还要游一游尔撒圣人降生处。”此外，赵振武等人还“游览达五德圣人的坟墓”，而此处“也是一座礼拜寺”。“筛赫杜查尼告我们说：这里——我们礼拜的处所——便是当年尔撒圣人接受仙席（马仪岱）^①的故迹。”“据杜氏说，这寺从先在耶稣教人手里，四百年前，他的先祖名杜查尼的，来到这里，从耶稣教人手中拿过来，改作礼拜寺，一直到现在。”（第120页）

2月18日，赵振武等人又前往耶路撒冷哭墙等地参访，他在日记中写道：“‘哀墙’——这是回犹争执的焦点，连年流血，都是为了它；我们必须看一看这两教都认为圣物的它。”（第122页）“我们探望了‘比比拉比尔’的坟，她在‘阿斯阿底夜’会馆之内，她是著名的女筛赫，在她的坟的附近有耶稣升天亭，亭内有石，据说是耶稣被难时，登在那块石上升天去了。耶稣教和回教人都认为那是圣地，都想保管这块圣地；因此，这块圣地又成了回耶两教的互争物。亭的南墙有回教人礼拜的米哈拉卜^②，而别的方面的墙上也有别教人的米哈拉卜。现在的景况，大约是这样：亭的管理权在回教手中，而同时各教人都可以进去礼拜，这样就可以息争了。院中有许多石位，据说是为在耶稣节日，各个不同的民族做礼拜的分野。”（第123页）他再次提到此前到访过的劳则大学，该校校长举行了欢迎会，“会场，是在该校寝室楼下的大客室里，这便是每主麻日下午允许耶稣教人做礼拜的区处”（第123页）。

不难看出，赵振武对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同源及争端有着清楚的认知。

第一，他在称呼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中共同的人物时，在不同宗教语境中使用了不同的汉语译名。如他在伊斯兰教中使用“尔撒圣人”

① 英文为Al-Ma'idah，今译为“马以代”，筵席之意。

② 英文为mihrab，意为凹壁。

的称谓，在基督教语境中则使用“耶稣”“耶稣升天亭”和“耶稣教”等概念；他在伊斯兰教中使用“达五德圣人”的称谓，这实则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中的“大卫王”。这反映了赵振武对于三大一神教的同源性了若指掌，并且十分精准地使用同一人物在不同宗教中的汉语译名。这缘于其深厚的伊斯兰教教义积淀，即尔撒（耶稣）、达五德（大卫王）等在伊斯兰教看来也是其先知。

第二，他认为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与基督教争夺一些圣地圣址取得胜利后，依旧对对方的宗教权益保持了宽容的态度。如伊斯兰教确保基督徒在特定的时间可以前往穆斯林控制的与尔撒（耶稣）相关的宗教圣址开展宗教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平息矛盾，并为避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徒之间聚在一起开展宗教活动可能产生的冲突，而在不同方位墙面设置“米合拉卜”，以“石位”来定位分配的区域。

第三，他体验到20世纪30年代初穆斯林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冲突日益明显，而英国当局则偏袒犹太人。他关注到“哀墙”是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争执的焦点，而“悬石圣殿”更是三教争夺之处。认为在英国当局偏向犹太人的前提下^①，圣殿山当时还能在穆斯林手中，离不开当地强有力穆斯林领袖的作用。

（三）对于基督教教士和西方人的观察

赵振武在前往埃及途中曾在沿途国家和地区上岸考察，也曾在巴勒斯坦诸多宗教圣地进行游历，在此过程中，对于基督教教士和西方人的一些举措进行了基于自身理解的人性分析，并流露出相较于基督宗教，对于伊斯兰教的个人浓厚感情。

1932年12月17日，赵振武等人在英国统治的锡兰上岸后，就其实地体验产生了不同于书本的看法。他在日记中写道：“据锡兰一瞥上

^①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英国当局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犹太社区在巴勒斯坦不断壮大，这引发了阿拉伯人的警惕，此后阿犹矛盾日益激烈。参见卢玉辉《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初期的英国对犹政策研究（1920—1930年）》，2019年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说，这里的摩尔人^①（说是信回教的）做生意很猾，要价一百卢比的，还价一卢比就卖。”“说到做生意滑头，那更不仅只是东方人为然，西方人在生意上准不欺人，准不滑头么？不过东方人技术来得妙些，令人当时觉不出而已！”（第26页）

1933年2月17日，赵振武等人的巴勒斯坦之行中，包括伯利恒之行，如前往尔撒圣人诞生处。他在日记中写道：“一进教堂的低小石门——‘躬身如也’而入的小门，便是一所很深远的大礼堂（因为耶教不叫大殿），走到尽头处，由右手方转向后面，一个看堂牧师模样的人燃着几只油烛，每人送给我一只，本来我们有手电灯，用不着他的油烛；可是，他的目的是要几个赏钱，不便使他心里不好过，所以一手持油烛，一手持手电，降级而下。”（第118页）

此外，在1月8日参观伊斯兰教圣人的郁斯福^②井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每人花了一角钱的入门费（这算特别的客气，因为我们是回教人；可是欧洲的耶稣教人，那要按官定的价格，每人两角哩）。”（第50页）而返回中国内地途中在香港上岸时，赵振武等人于5月13日参访了摩罗坟山，他在日记中写道：“坟山之南是天主教墓地；更南是耶稣教墓地。唯回教坟山高踞在上，俯视两教墓地，如在盆底，形势之优美，无复加矣！”（第207页）

不难看出，赵振武对于伊斯兰教充满感情。他虽然较为客观看待基督宗教，但这种爱教的感情溢于言表。

第一，他认为在做生意上的精明和狡猾实际上是东西方人皆有之共性。他认为单单指责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是不客观的，西方人在生意上也会如此。他特意提及这些锡兰摩尔人的伊斯兰信仰，也是为了从宗教信仰多元的角度来凸显，信徒在做生意上的精明乃至狡猾与否实际上与东西方的宗教没有关联。

第二，他认为在尔撒（耶稣）诞生的圣诞教堂中的神职人员，存

① 英文为moors，斯里兰卡摩尔人自认为是阿拉伯摩尔人的后代。

② 今译为“优素福”，伊斯兰教先知之一，先知叶尔孤白之子，即基督教中的约瑟。

在功利化的经济诉求。他的理由是自己已经拿着手电，但牧师仍旧送上蜡烛，这对于自身而言毫无必要。于是他认为牧师的做法是为了“赏钱”。他的理解不一定是事实，但反映了他对于尔撒诞生处基督教牧师某些做法的不悦态度。

第三，他认为在一些事件或场景中，穆斯林相较于基督宗教处于某种优势地位。如在开罗参观郁斯福（约瑟）井这一景点时，欧洲的基督徒只能按照“官定的价格”买票入场，而他们作为外国穆斯林，显然是受到了某种优待，付出的门票价格只是前者的一半。他显然体会到在埃及这样的伊斯兰国家之中，对于各国穆斯林存在着事实上的偏好。他在香港摩罗坟山发现伊斯兰教墓地的地势高于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墓地时，强调了“高踞”与“俯视”，这流露出他的某种惊喜之情，毕竟此时的香港尚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四）对西方教育及现代化发展的羡慕与矛盾心理

赵振武在埃及和沙特等地的游历中，一方面对于西方的教育存在着肯定，但另一方面也对于欧化存在着忧心，甚至认为会对于伊斯兰美德造成冲击。

1932年12月31日，他所乘邮轮路过苏伊士运河，他在日记中写道：“苏伊士运河之极北端有法国人雷塞^①的铜像，他是开凿运河者，直到现在受人们的景仰。”“开运河的工人哪个不是当地的回民？只有他的铜像巍巍乎耸峙着，这只是因为他有可以使人景仰的智慧和头脑。教育是无价的呀！”（第30页）

1932年1月9日，他在赴埃及教务院视察部长哈礼德贝家中参加宴会时，在日记中写道：“他的席，却纯粹西餐式。”（第25页）2月6日，他在参观埃及开罗一所师范学校时，在日记中写道：“校长穆斯塔法博士，年岁已经很高。他是英国留学生，学问、思想都很好。”（第91页）2月12日，他拜访了埃及文学院，在日记中写道：“教员

^① 法文为Ferdinand Marie Vicomte de Lesseps，今译为雷塞布（1805—1894），法国外交官和实业家。

三十五人，多为英美人，教授史地，各国文学，如英法文西伯来文等。”（第106页）2月13日，他在日记中对于当时埃及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知道埃及的教育随时都在进步的状态中；只是利弊往往相连，因为教育形式的效法欧洲，而连带及于其他的一切如衣装、举止、奢华……亦无不效法欧人，日超欧化！深恐年代一久，伊斯兰的美德怕要沦于异化！这是我们冷眼观察的一点杞忧。”（第107页）

3月2日，赵振武等人赴沙特财政大臣在麦加的家中参加宴会，他除了感受到财长家中的发电机和无处不在的电灯外，还留意到：“这在阿拉伯的麦加地方，算是有名的盛宴；何况他的菜多半是西餐，菜目总共在十五个以上……举动的确奢华得很！席上宾主只顾吃喝，却都没说什么话。”（第140页）

不难看出，他认为教育对于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西方人的智慧与头脑比当地穆斯林工人在开凿运河上更为令人景仰，而这得益于教育的作用。欧洲的学问值得肯定，埃及引进欧洲的教育模式也有助于该国教育的进步和某种文化包容，因为他留意到埃及文学院的英美教员甚至开设了希伯来文的讲授。

但他对于来自欧洲教育的副产品，认为“奢华”对伊斯兰美德存在侵蚀。因此，他在开罗和圣城麦加赴宴时，对埃及和沙特高级官员主要以“西餐”的“举止”和待客的“奢华”存在一定的抗拒心态，尤其对于后者，他实际上认为此类宴席并未能实现深度的沟通功效。

（五）对于欧洲殖民大国的伊斯兰朝觐管理有所提及

赵振武等人对于朝觐完以后如何返回中国进行了诸多的考量，最终决定在圣城麦加买好返回的船票。之所以做出如此决策，与欧洲殖民大国的朝觐管理有着密切关联。

1933年3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印度和爪哇的人都受了英、荷政府的政令制限，购买来回票，而他们却往往居麦加一二年不愿回国，所以转卖他们的票给要回去的人，价钱比到公司去买公道

些。”（第144页）

他注意到英国当局对于印度穆斯林、荷兰当局对于东印度群岛穆斯林，在前往麦加朝觐问题上的管理片断，即要求购买往返票。但这也存在着一定的漏洞，英、荷治下的许多穆斯林滞留麦加并低价转让按要求购买的返程票，这就为其他朝觐者提供了“捡漏”的机会。事实上，虽然英荷当局具有基督教背景，但这些国家在朝觐管理现代化上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荷兰当局的影响下，欧洲殖民当局逐渐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朝觐管理政策。^①

二、《西行日记》中的基督教观 和西方观及思想局限性

赵振武《西行日记》的重心是记录如何护送几位中国穆斯林青年才俊前往伊斯兰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留学，以及与其他几位完成任务的同行穆斯林学者游历耶路撒冷、麦地那，完成麦加朝觐并最终返回中国的全程。但他也不吝啬笔墨，通过自己的实地观察和体验，在碎片化的日记文字中呈现自己的基督教观和西方观，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赵振武强烈的爱国、反帝情怀使然，这使其能对伊斯兰世界的反帝思潮及其宗教归因产生某种共鸣。

赵振武是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回族知识分子。1933年4月4日，在麦加朝觐期间前往阿拉法特之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每一个民族的或一个国籍的哈吉们都有他们的特别记号或旗帜，飘扬在帐篷上面，中国的……国旗，也在一面大的绿旗之下……我们的车——虽然经过几次推车，便一直的开到……旗的帐篷之前。”（第174—175页）

① 参见 Robert Bianchi, *Guests of God: Pilgrimage and Politics in the Islamic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赵振武所处的时代，恰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不断加深，中华民族危机日甚之际。他在日记中多处提及自身对于中日战争与冲突的高度关切。1933年1月5日，此时他已抵达开罗，他写道：“今天的报上说：三日，中日在山海关附近发生战事。”（第46页）2月1日，他收到了友人的信，他写道：“他们的信是一月五日写的，报告三日日军占领山海关，和这里报载情形相符。”（第84页）3月7日，他在沙特财长宅内得到消息，“国卿为协助中国起见，决定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自昨日起，所有纸币均予停兑”（第145页）。4月17日，在沙特访问埃及领事，“询问有无新的消息属于埃及方面和中日方面的”（第188页）。4月19日，他在德国领馆拜访友人，他写道：“据说，距北平三十启罗米达以北之地，都在日的势力范围之内，真可叹！”“海外的人们只知道日本如何如何！而不知道一点中国的情形，因而无法传得人们的同情心。这是多么可悲的事！”（第189页）5月13日，抵达香港以后，他写道：“按照报纸的记载，谓十一、十二两日，日机飞平，掷炸弹；今晨平市阴雨所以飞机未到。”（第208页）实际上，赵振武对于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存在着警醒，他仍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视为中国的一部分，1932年12月11日，他在香港购物时如此表述：“自己国里人在自己国家里买东西。”（第14页）

其次，赵振武深厚的宗教造诣和在圣地对于三大一神教关系的实地观察使然。他是回族知识分子，尤为关键的是，他曾担任《月华》杂志主编，该杂志很重要的职能便是“阐释回教教义”。他护送青年穆斯林学子赴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并与该校领导和知名学者进行直接交流，这都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其对伊斯兰教的认知。他前往巴勒斯坦诸多圣地的参访活动，切实提升了对于基督教的感性认知，他对于基督教的本身能够保持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但他非常注意在中文语境中坚持伊斯兰教的立场，对于基督教中的耶稣、大卫王、耶路撒冷、伯利恒等词汇严格地限定了使用范围。此外，他的一些汉语表述也显然借鉴了基督宗教的词汇，如用天主教的“教皇”一词来称呼长期存在

的伊斯兰世界最高领袖“哈里发”^①。

《西行日记》对于基督教的认知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对于基督教具体的教义缺乏较为深度的解读，主要是对基督教的节日、教堂、墓地进行了零碎的记述，与牧师的接触也较为有限。正因如此，他对于西方的认知也存在着矛盾，对于基督教、帝国主义以及教育、基建和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存在着模糊。

首先，这与赵振武的知识结构有关。他在北平重要的牛街清真寺接受过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外语教育，也曾就读于法政专门学校边政系，但赵就读之时，边政（frontier affairs）学并未成型。有观点认为，直到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才是边政学的黄金时间，抗战胜利后便呈颓势了。^②此后他或在政府部门工作，或在大学历史系、伊斯兰教的师范学校任教，或担任中国伊斯兰和回族研究杂志主编。他似乎未能具有从体系化的全球视野来观察基督教和基督教背景的西方。这也体现在他对于1933年朝觐者锐减的理解上，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当年朝觐者数量远不及往年，他同行的马松亭问一位穆斯林学者哈密德：“朝觐的人数，据说这几年来，逐年减少；今年尤不踊跃，这是什么原故？”而他记录哈密德的回答则是：“原因复杂的很！”“可是，最大的病因，那要算这一样：历年来朝的人中，属于知识阶级的分子太少！”（第161页）实际上，他完全没有意识到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才是导致那几年朝觐者锐减的主要原因，朝觐经济也是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③

其次，语言能力限制了赵振武对于基督教更为深入的交流与观察。

① 英文为Caliph，该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西行日记》指称清真寺里面的学生时，用了该词的音译“海里凡”，参见赵振武《西行日记》第13页。就狭义而言，《西行日记》里特指伊斯兰教正统哈里发时，用了该词的另一个音译“哈里法”，参见赵振武《西行日记》第65页。

② 参见汪洪亮《抗战时期边政学的兴起及其“学科性”（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③ 参见钮松、张璇《沙特阿拉伯历史进程中的朝觐经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4期。

他在乘坐前往埃及的意大利邮轮之初便清晰意识到：“一个人想在现代社会里活动，至少须通两国以上的语言，除掉他本国的语言以外。否则，你便到处受制！”（第16页）去程在香港上岸期间询问几位印度人：“‘你们可是穆斯里曼^①？’——用英语和阿拉伯语的混合语。”（第12页）在船上展开救生演练时，“我们不认识意大利文和英文，所以着慌”（第24页）。去程在新加坡上岸拜会《导报》（*Al-Huda*）主笔阿拉伯人 Abdul Wahidel Chilani 时，他坦言“我因为我的语言不能痛痛快快地传达心里所要说的话，便把我们印就的谈话给了他两份”（第20页）。他尤其强调“今天所有的谈话，都是用我们那半口极不流利，极不自然的阿拉伯语”（第22—23页）。在沙特会见俄国领事时，两人“都愿意抛去土语，而说不流利的阿拉伯语”（第134页）。由此可见，赵振武不会英语，其阿拉伯语水平也远不如其土耳其语水平，这也极大限制了他在邮轮上，在巴勒斯坦圣地和旅途途经地对于基督教的观察和交流，如在圣诞教堂对于牧师为了“赏钱”而递上蜡烛的熟知，实际上缺乏两人直接对话的佐证，主要是其自我的心理分析得出的结论。

结 语

《西行日记》成文于20世纪30年代初，欧洲旧殖民主义正在走向衰弱，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兴起，新的世界大战也正在酝酿之中的这一历史时刻。特别是埃及王国从形式上从英国获得了独立，但仍受制于英国。巴勒斯坦处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但阿犹矛盾正在不断上升，此时英国对犹太人的支持引发了阿拉伯人的不满。而沙特阿拉伯王国则在赵振武踏上旅途的前两个月正式成立。总体来看，赵振武所经之处处在一种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为其旅途的平稳展开，

^① 结合原文，应为 Muslim man。

在沿途的顺利参访，以及在埃及、巴勒斯坦和沙特的深度考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实际上，赵振武自中国前往埃及，自埃及前往沙特，自沙特返回中国，所乘船舶也是由意大利和英国的公司所运营。《西行日记》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化成就和基督教背景之间的关系有着感性的思考，但难以形成系统化的分析，对于基督教相关的宗教了解主要基于伊斯兰教自身的教义和历史知识，对于基督教信徒、神职人员的观察则实际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未有明显的直接互动与交流。但难能可贵的是，《西行日记》在秉持爱国爱教立场的同时，对于基督教本身保持着相对客观和理性的观察态度，传递出一种和平与中道的精神。